

容齋隨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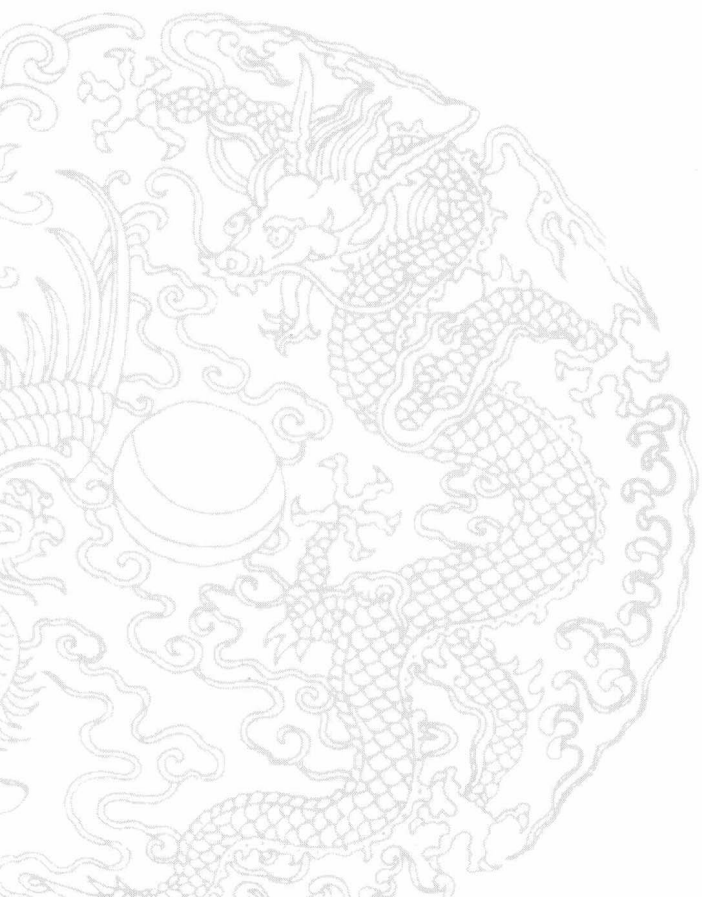
(二)

〔宋·洪迈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宋】
卷二
第二册

容斋随笔

北京燕山出版社



容斋续笔

第一卷

颜鲁公

颜鲁公忠义大节，照映今古。岂唯唐朝人士罕见比伦，自汉以来，殆可屈指也。考其立朝出处，在明皇时，为杨国忠所恶，由殿中侍御史出东都、平原。肃宗时，以论太庙筑坛事，为宰相所恶，由御史大夫出冯翊。为李辅国所恶，由刑部侍郎贬蓬州。代宗时，以言祭器不飨，元载以为诽谤，由刑部尚书贬峡州。德宗时，不容于杨炎，由吏部尚书换东宫散秩。卢杞之擅国也，欲去公，数遣人问方镇所便，公往见之，责其不见容，由是衔恨切骨。是时年七十有五，竟堕杞之诡计而死，议者痛之。呜呼！公既知杞之恶已，盍因其方镇之问，欣然从之。不然，则高举远引，挂冠东去，杞之所甚欲也。

而乃眷眷京都，终不自为去就，以蹈危机，《春秋》责备贤者，斯为可恨。司空图隐于王官谷，柳璨以诏书召之，图阳为衰野，堕笏失仪，得放还山。璨之奸恶过于杞，图非公比也，卒全身于大敌之世，然则公之委命贼手，岂不大可惜也哉！虽然，公囚困于淮西，屡折李希烈，卒之捐身殉国，以激四海义烈之气，卢元反正，实为有助焉。岂天欲全畀公以万世之名，故使一时堕于横逆，以成始成终者乎！

〔译文〕鲁国公颜真卿的忠义操守，光辉照耀今古，像他这样的人不仅在唐朝人中非常罕见的，而且从汉朝以来，像他这样的人也是屈指可数的。考查一下他在朝廷做官时起伏波折的经历，在唐明皇时，他被杨国忠所憎恶，由殿中侍御史



颜真卿像，图出自明·天然撰《历代人物像传》。颜真卿字清臣，唐代著名书法家，被封鲁国公，故后人又称其为“颜鲁公”。

的身份被调任东都（今河南洛阳）判官和平原郡（今山东德州）太守。唐肃宗年间，他又因批评太庙筑坛的事，被宰相所厌恶，从御史大夫的任上被调到冯翊（今陕西大荔）任太守。后来又被宦官李辅国所憎恨，由刑部侍郎被贬黜到蓬州（今山东蓬莱）做长史。唐代宗时，颜鲁卿又议论祭器不整齐完备，宰相元载认为他是诽谤朝政，就把他从刑部尚书的任上贬降到峡州（今湖北宜昌）任别驾。德宗时，颜真卿受到杨炎排挤，从吏部尚书调到东宫任太子少师的闲职。奸相卢杞专权的时候，又想要把颜真卿排挤出京城去，几次派人去问他想到哪个方镇去做官。颜真卿去见卢杞，责问他为什么容不得自己在京城？因此，卢杞更加恼恨真卿。这时，真卿已经七十五岁了。后来卢杞用借刀杀人的诡计，派真卿当使臣到叛将李希烈那里去招降，不幸被李希烈所害。评论这件事的人都为之叹息。唉！真卿既然知道卢杞厌恶自己，为什么不在卢杞派人问他想要去哪个方镇当长官的时候，欣然接受，到外地做官呢？再不然就索性远走高飞，辞职东出潼关，这更会受到卢杞的欢迎。可是真卿却眷恋着京城，始终不愿离开，以致一步步走向死亡。《春秋》上常常责备贤能的人，这种说法最令人感到遗憾。唐朝的诗人司空图隐居在中条山的王官谷中，奸臣柳璨利用诏书召他到京城做官，司空图装作年老力衰，故意把笏掉到地上，以致失去礼仪，于是没被任命，让他回家了。柳璨的奸恶比卢杞更厉害，司空图更是无法和颜真卿相比，但司空图最终却能在乱世之中保全自身。这样看来，真卿死在叛贼手里，岂不是太可惜了吗？不过，真卿被叛贼囚禁时，屡次大义凛然地痛斥李希烈，最后壮烈而死，因而激发了天下士人忠烈正义之气，这对后来唐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年）由乱到治，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推进。这或许是有上天有意要让颜真卿万世流芳，所以才让他在晚年身陷叛贼之手，最终慷慨就义，从而实现他光辉义烈的一生吧！

戒石铭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太宗皇帝书此以赐郡国，立于厅事之南，谓之《戒石铭》。案成都人景焕，有《野人闲话》一书，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颁令箴》，载蜀王孟昶为文颁诸邑云：“朕念赤子，盱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区区爱民之心，在五季诸僭伪之君为可称也，但语言皆不工，唯经表出者，词简理尽，遂成王言，盖诗家所谓夺胎换骨法也。

〔译文〕“你们的薪水俸禄，都是民脂民膏；虽然百姓容易虐待，但上天却难以欺骗。”宋太宗写了这段话，赐给各地方官员，让他们把这段话刻在石碑上并把石碑立在官府大堂南面，称作《戒石铭》。成都人景焕曾著有《野人闲话》一书，是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所著述的。第一篇名叫《颁令箴》，记载了后蜀国王孟昶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分发给各地方长官，说：“我关心百姓，勤于政务。要求各位令、长，一定要爱护黎民。治理地方要达到蝗虫要灭绝，鸟兽懂礼仪，儿童有仁爱之心这样三异的水准，要让百姓弦歌称赞政务做得好。要像驱鸡那样恰到好处，要像时苗留犊那样清正廉洁，政治要宽严相济，才能移风易俗扶植正气。不能使百姓的利益遭到侵

害，不要让百姓遭受苦难。虐待百姓虽然非常容易，可是却很难欺瞒上天。田赋和车马是国家的要事，是军队和政府的凭借。我对你们的赏罚，是决不会迟疑的。你们的薪俸，都是民脂民膏。身为百姓的父母官，每个人都要以对百姓仁慈为根本。希望你们都要以此为鉴戒，深刻地体会我的良苦用心。”孟昶一共写了二十四句话。孟昶的这点爱民之心，在五代十国那些割据地方、自称帝王的君主里面是值得赞扬的。但他这篇文章语言不精炼，只有从中总结出来的四句，言简意赅，富含哲理，于是成为帝王的不朽名言。这种方法，或许就是诗人们常用的脱胎换骨的写作技巧。

双生子

今时人家双生男女，或以后生者为长，谓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为长，谓先后当有序。然固有经一日或亥、子时生，则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时为弟，巳时为兄，则弟乃先兄一时矣。按《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何休注云：“子谓左右媵及侄娣之子，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其双生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乃知长幼之次，自商、周以来不同如此。

〔译文〕现在人家生了双胞胎，有的以后生者为大，说是受胎在前；有的以先出生者为大，说是以先后出生为序。然而，有这样一种情况，就很奇怪了，如果以受孕的时间为标准判定哥哥弟弟，即后出生者为大，那么，如果一个在亥时出生，即夜间9时至11时出生，一个在子时，即夜间11时至次日1时出生，则弟弟比哥哥早出生一天；如果一个是辰时，即上午7时至9时出生，一个是巳时，即上午9时至11时出生，则弟弟比哥哥早出生一个时辰。按《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的说法，立嫡长子是年长者，立子嗣即传宗接代的儿子靠的是尊贵的地位，而不是是否先出生。何休注云：大人告诉自己的诸妾及弟媳生的儿子，尚实的人根据亲疏关系，要在嫡长子身后，立他的弟弟为继承人，而崇尚礼节的人却要根据其尊贵程度立嫡长孙为继承人。如果是双胞胎，尚实的人根据见到的顺序立先生的为大，崇尚礼节的人却依据实质上的受胎顺序立后生的为大”，这样就知道了长幼的次序，自商周以来，就是这样不同的情况。

李建州

建安城东二十里，有梨山庙，相传为唐刺史李公祠，予守郡日，因作祝文曰：“亟回哀眷。”书吏持白回字犯相公名，请改之，盖以为李回也。后读《文艺·李频传》，懿宗时，频为建州刺史，以礼法治下。时朝政乱，盗兴相椎敝，而建赖频以安。卒官下，州为立庙梨山，岁祠之，乃证其为频。继往祷而祝之云：俟获感应，则当刻石纪实。已而得雨，遂为作碑。偶阅唐末人石文德所著《唐朝新纂》一书，正纪频事，云除建州牧，卒于郡。曹松有诗悼之曰：“出旌临建水，谢世在公堂。苦集体藏篋，清资罢转郎。瘴中无子奠，岭外一妻孀。恐是浮吟骨，东归就故乡。”其身后世落拓如此。《传》又云：“频丧归寿昌，父老相与扶柩葬之。天下乱，盗发其冢，县人随加封掩。”则无后可见云。《稽神录》载一事，亦以为回，徐炫失于不审也。

〔译文〕福建建安郡（今福建建瓯）城东二十里，有座梨山庙。相传是唐代李刺史 的祠庙。我在这里担任太守的时候，曾经写了一篇祭文去祭祀他。文中有“亟回哀眷”一句，办事的书吏说这个“回”字冒犯了李刺史的名讳，请我改一下，这是因为他以为李刺史就是李回。后来，我读了《唐书》中的《文艺·李频传》其中记有唐懿宗时李频担任建州刺史，用礼法治理地方的事务。当时朝政混乱，到处有盗贼杀人抢劫的事件发生，而只有建州因为李频治理得当而非常安定。后来李频在任上死去，建州的后继官长为纪念他，特意在梨山建庙，每年都要进行祭祀。这就证明了此庙是李频的祭庙。后来我又去祈祷并许愿说：如果能得到灵验，就刻块石碑把他的事迹记下来。不久，果真下了一场雨，于是我就为他立了一块碑。后来偶然看到唐末石文德所著的《唐朝新纂》一书，书中恰好记载有李频的事。书上说，李频担任建州太守，死在任上。曹松曾经写了一首悼念他的诗说：“出旌临建水，谢世在公堂。苦集休藏篋，清资罢转郎。瘴中无子莫，岭外一妻孀。恐是浮吟骨，东归就故乡。”他死后的事竟然凄凉到这种程度。他的传记里又说：“李频去世后被送回故乡寿昌（今浙江建德南）时，是由父老乡亲们把灵柩下葬入土的。后来天下大乱，有盗墓贼挖掘了他的坟墓，县里人又帮助掩盖起来。”由此可知，李频确实是没有后代的。本朝的《稽神录》也记载了这件事，并认为是李回。这是因为作者徐炫没有认真地考证。

侍从官

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为侍从官，令文所载也。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死于广陵，车驾将幸建康，从官列衔上奏，乞同班入对。时汤岐公以大观文为行宫留守，寄声欲联名，众以名位不同为辞。岐公曰：“思退亦侍从也。”然竟不克从。绍熙二年，吏部郑尚书侨上章乞荐士，诏令在内近臣台谏、在外侍从，各举六人堪充朝士者。吏部遍牒，但及内任从官与在外侍制以上，而前宰相执政皆不预。安有从官得荐人，而旧弼乃不然，有司之失也。

〔译文〕自观文殿大学士一直到待制，都属于侍从官范围，这是国家律令明文规定的。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国国君完颜亮被叛乱的士兵杀死在广陵（今江苏扬州），高宗打算到建康（今江苏南京）进行巡视，侍从官们一起写奏章劝阻，还准备集体向皇帝当面上奏，当时岐国公汤思退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资格担任行宫留守，让人传话说也想参加联名，大家认为他和他们不属于同一系列的官员，而不允许他参加。汤思退说：“我也是侍从官。”但最终他仍然没有如愿。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吏部尚书郑侨向皇帝上奏，要求举荐人才，皇帝下诏，让宫内近臣、台谏各官和在外的侍从官们分别推举六名能够充当朝廷官员的人才。于是吏部便发出通知给在宫内的现任侍从官和在外的侍制以上的官员，让他们举荐人才，可是自始至终却没有要求当过宰相执政的大臣也举荐人才。难道侍从官可以举荐人才而前宰相却不能举荐人才吗？这是吏部官员的失误。

存亡大计

国家大策，系于安危存亡。方变故交切，幸而有智者陈至当之谋，其听而行

之，当如捧漏瓮以沃焦釜。而愚荒之主，暗于事几，且惑于谀佞孱懦者之言，不旋踵而受其祸败，自古非一也。曹操自将征刘备，田丰劝袁绍袭其后，绍辞以子疾不行。操征乌戎，刘备说刘表袭许，表不能用，后皆为操所灭。唐兵征王世充于洛阳，窦建德自河北来救，太宗屯虎牢以扼之，建德不得进，其臣凌敬请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关中骇震，则郑围自解。诸将曰：“凌敬书生，何为知战事，其言岂可用？”建德乃谢敬。其妻曹氏，又劝令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围何忧不解。建德亦不从，引众合战，身为人擒，国随以灭。唐庄宗

既取河北，屯兵朝城，梁之君臣，谋数道大举，令董璋引陕、虢、泽、潞之兵趣太原，霍彦威以汝、洛之兵寇镇定，王彦章以禁军攻郢州，段凝以大军当庄宗。庄宗闻之，深以为忧。而段凝不能临机决策，梁主又无断，遂以致亡。石敬瑭以河东叛，耶律德光赴救，败唐兵而围之，废帝问策于群臣。时德光兄赞华。因争国之故，亡归在唐，吏部侍郎龙敏请立为契丹主，令天雄、卢龙二镇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楼，朝廷露檄言之，虏必有内顾之虑，然后选募精锐以击之，此解围一策也，帝深以为然。而执政恐其无成，议竟不决，唐遂以亡。皇家靖康之难，胡骑犯阙，孤军深入，后无重援，亦有出奇计乞用师捣燕者，天未悔祸，噬脐弗及，可胜叹哉！

〔译文〕国家的重要决策，关系到安危存亡。当各种变故交错出现在一起时，如果幸运而君主也能够按照有识之士提出的正确的计策去做的话，那么，就好比捧着漏瓮去浇烧焦的锅一样，可以立竿见影。而昏庸的君主，看不出事变的征兆而且容易被谄媚怯懦之人的话所迷惑，这样的人一定很快就会败亡，自古以来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很多了。三国时期曹操曾亲自领兵去征讨刘备，田丰劝袁绍趁着这个机会去突袭曹操的后方，但袁绍借口儿子有病而不出兵，曹操领兵去攻打北方的乌桓，刘备劝说刘表趁机从南方攻打曹操的巢穴许都（今河南许昌），刘表没有采纳刘备的建议，结果袁绍、刘表先后都被曹操灭掉了。唐朝初年，唐兵去洛阳攻袭郑国的王世充，窦建德从河北出兵前来救援，唐太宗李世民在虎牢关屯兵阻截，窦建德无法攻破关城，进退两难。这时，窦建德的部下凌敬献计：请求全军渡过黄河，占领怀州、河阳（今河南沁阳、孟县），再翻越太行山，进入山西上党（今山西长治）境内，沿汾水晋州（今山西临汾）直指蒲津关（在今山西永济西），这一带唐军防守非常薄弱，必然可以如入无人之境，这个计策是取胜的万全之法，肯定能使关中



汉昭烈帝刘备像，图出自明·天然撰《历代古人像赞》。

地区（今陕西西安一带）震动，这样洛阳之围就可以解了。但是，窦建德部下将军们却说：“凌敬只不过是个一介书生，哪里懂得什么军事？他的话是千万不能听从的。”于是建德没有采纳凌敬的建议。建德的妻子曹氏，又劝他趁唐军后方防守不严的时机，集中兵力，稳扎稳打，夺取山北地方，再包抄西边的关中，如此一来，唐兵必然回兵救援，对郑国的包围自然就解除了。但是建德仍然没有采纳他妻子的意见，而是领兵与唐兵进行硬拼，结果他被唐兵活捉，他的国家也随之灭亡了。

五代时期后唐庄宗占领河北地区后，在朝城屯兵，梁国君臣商议，决定分兵几路大肆进攻，让董璋率领陕州（今河南陕县）、虢州（今河南灵宝）、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四州的兵力攻打太原；霍彦威率领汝州和洛阳的军队攻打镇定（今河北石家庄一带），王彦章率领禁军攻打郢州（今山东郢城），而以招讨使段凝统帅主力去抵挡唐庄宗。庄宗得知消息后，非常忧虑，但是由于段凝不能临机决策，梁国国君又优柔寡断，结果导致国家灭亡。

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发动叛乱，契丹族领袖耶律德光率兵去救援他，将前来讨伐的唐兵打败，并把唐兵包围起来。后唐废帝听到这个消息，就向群臣征求对策。当时，耶律德光的哥哥耶律赞华，由于和德光争夺王位而失败，逃亡在后唐，吏部侍郎龙敏便请求策立赞华为契丹国王，命天雄、卢龙两镇（管辖河北大名至北京以北一带）节度使派兵将他送回国即位，经幽州（今北京西南）直奔西楼（今内蒙古林西），朝廷再发出檄文通告这项决定。契丹人肯定担心发生内乱，军心动摇，这时再派精兵发动猛攻，这是解围的一个良策，废帝也觉得这是个好计策。可是执政大臣却担心这个计策不能带来好的结果，长时间议而不决，以致失去时机，后唐也因此亡国。我们大宋历经靖康之难，金兵侵犯国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孤军深入，缺少有力的后援，当时也有人献出很好的计策，请求派精锐兵力趁机直捣金国后方的幽燕地区，或许是老天有意给大宋降下灾祸，而此计没被采用，以致后来追悔莫及，真是可叹啊！

唐人诗不传

韩文公《送李础序》云：“李生温然为君子，有诗八百篇，传咏于时。”又《卢尉墓志》云：“君能为诗，自少至老，诗可录传者，在纸凡千余篇。无书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任登封尉，尽写所为诗，投留守郑余庆，郑以书荐于宰相。”观此，则李、卢二子之诗多而可传。又裴迪与王维同赋辋川诸绝，载于维集，此外更无存者。杜子美有寄裴十诗云：“知君苦思缘诗瘦”，乃迪也，其能诗可知。今考之《唐史·艺文志》，凡别集数百家，无其书，其姓名亦不见于他人文集，诸类诗文中亦无一篇。白乐天作《元宗简集序》云：“著格诗一百八十五，律诗五百九。”至悼其死，曰：“遗文三十轴，轴轴金玉声。”谓其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今世知其名者寡矣，而况于诗乎！乃知前贤遗稿，湮没非一，真可惜也！

〔译文〕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的《送李础序》中说：“李生是位谦和的君子，写了八百篇诗，在当时这些诗都被互相传诵。”又在《卢尉墓志》中说：“卢君能写诗，从年轻时写到老，值得抄录流传的诗，写在纸上的有一千多首。他为了能写好诗，见书就读，然而都是为了写诗。他担任登封（今属河南）县尉的时候，抄写

了自己的所有诗作，送请留守郑余庆审阅，余庆为此特意写了一封信，把他推荐给了宰相。”从这里来看，李、卢二人所写的诗，是有很多可以流传的。裴迪和王维一同写过描写辋川的很多绝句，这些都录载在王维的诗集里，除此之外，裴迪便没有别的诗流传了。杜甫有《寄裴十》诗，诗中亦有“知君苦思缘诗瘦”的句子。裴十就是指裴迪，由此看出，他是能够写诗的。今查《唐书·艺文志》，其中著录有诗集的诗人数百位，但是却没有裴迪的诗集，就连裴迪的姓名，在其他人的文集中也查不到，而且各类诗文中也没有收录他的一首诗。白居易作《元宗简集序》说他“著有一百八十五首格诗，律诗五百零九首。”又在悼念他逝世的诗中说：“遗文三十轴，轴轴金玉声。”评价他的诗文古朴平易但不鄙俗，新奇而不怪诞。可是现在知道他名字的人已经很少了，更不要说他的诗作了！由此可知，过去文人才子的遗作，有很多都已湮没失传了，真是太令人惋惜啦！

泰誓四语

孔安国《古文尚书》，自汉以来，不列于学官，故《左氏传》所引者，杜预辄注为逸书。刘向《说苑·臣术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有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逐。’此所以劝善而黜恶也。”汉武帝元朔元年，诏责中外不兴廉举孝。有司奏议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有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其语与《说苑》所载正同。而诸家注释，至于颜师古，皆不能援以为证。今之《泰誓》，初未尝有此语也。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然年月不与序相应，又不与《左传》、《国语》、《孟子》众书所引《泰誓》同，马、郑、王肃诸儒皆疑之，今不复可考。

〔译文〕汉朝孔安国注解的《古文尚书》，从汉朝以来就没有被列入学生必读的经书中去，《左传》里所引用的，杜预注释《左传》时，都注明引自亡佚的《尚书》。汉朝刘向所著的《说苑·臣术篇》中说：“《尚书·泰誓》说：‘附和属下而蒙蔽上司的要处死，迎合上司而蒙蔽属下的要受刑罚；参与处理国家大事却不能为百姓谋福利的人都要贬职，担任高级职务却不能举贤荐贤



孔安国像，图出自明·吕维祺《圣贤像赞》。
孔安国为孔子十一代孙，是西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

能的人都要免职。’这是用来鼓励人多做一些好事而少做一些坏事的方法。”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下诏斥责内外官员不能提倡廉洁和举荐贤才，有关官员上奏章说：“凡附和下属而蒙蔽上司的要处死，迎合上司而蒙蔽下级的要受刑罚；参与国家大事却不能为百姓谋福利的都要罢黜。高高在上却不能举荐贤才的人都应免职，用这种方法来鼓励人多做好事，少做坏事。”这话和《说苑》里所载的话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各家在注释《尚书》时，直至唐朝奉旨考订五经的颜师古，都没有引用这些话作为旁证。现今的《泰誓》里，本来并没有这段话。汉宣帝时，河内（今河南沁阳）有个女子，发现了一篇《泰誓》古文，就把它献给了朝廷，但是文中的年月与次序有差别，又和《左传》、《国语》、《孟子》等书所引用的《泰誓》原文不同。因此，司马迁、郑玄、王肃等学者都怀疑那个女子所献的书是一篇假作，现在这些都很难去考证了。

重阳上巳改日

唐文宗开成元年，归融为京兆尹，时两公主出降，府司供帐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赐宴，奏请改日。上曰：“去年重阳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阳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阳，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郑谷所赋《十日菊》诗云：“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亦为未尽也。唯东坡公有“菊花开时即重阳”之语，故记其在海南艺菊九畹，以十一月望，与客泛酒作重九云。

〔译文〕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归融担任京兆府尹时，有两位公主出嫁，府里和有关衙门准备物品和庆贺事宜非常繁忙，而当时又临近三月三日的上巳节，皇帝照例要在这一天去京都郊外的风景区曲江大宴群臣。府尹实在忙不过来，就上奏请求把宴会日期改掉。文宗皇帝回复说：“去年重阳节改为九月十九日，并没失去重九的本来意义，今年上巳就改为三月十三日吧。”自古以来，上巳、重阳都有固定的日期，但也有延期十天的例子。由此可见，唐朝诗人郑谷所作的《十日菊》诗说：“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也是重阳还没有过去的意思。惟有苏东坡有“菊花开时即重阳”的诗句，是记他在海南做官时种菊花九畦，在十一月十五日与客人饮酒赏菊，仍然能够把那天当作九月九日重阳节来过。

田宅契券取直

《隋书·志》：“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欲为惩劝。虽以此为辞，其实利在侵削也。”今之牙契投税，正出于此。田宅所系者大，奉行唯谨，至于奴婢马牛，虽著于令甲，民不复问。然官所取过多，并郡县导行之费，盖百分用其十五六，又皆买者独输，故为数多者率隐减价直，贖立岁月，坐是招激诉。顷尝因奏对，上章乞蠲其半，使民不作伪以息争，则自言者必多，亦以与为取之义。既下有司，而户部引条制沮其说。

〔译文〕《隋书·食货志》记载：“自从东晋建立之后，凡买卖奴婢、牛马和田

宅的，立有文书契据的，每交易一万钱，要拿出四百钱交给官府，卖方交三百，买方交一百。没有文书契约的，也收百分之四，叫做‘散估’。南朝的宋、齐、梁、陈几个朝代，都是这样征收，早已形成惯例。因为人们都争着去做商贩谋利，就不想去种田了。所以改为设立均输官员负责，统一征收，目的是对商贩进行惩戒。虽然以此为借口，但实际上是为了侵夺商贩的实利。”现在实行的牙税、契税，就是由此而来。田地房屋的买卖，关系重大，所以实施必须慎重；至于奴婢马牛的交易，虽然有明文规定，但百姓并不认真执行。不过，官府从交易中抽税过多，再加上地方衙门还要另抽导行费，总共大约要征收百分之十五六，而且又是买方独自负担这些税费，因此许多人都是常常隐瞒，故意压低实际交易的款额，或推迟不缴，以致经常引起纠纷诉讼。关于这个问题，前些时我曾给朝廷写了奏章，要求把这些税减免一半，使百姓们不再作伪造假，以平息纠纷，这样，自己主动报税的必然会日渐增多，这也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皇上把奏章交给有关部门商议，而户部仍然要采用历史上的条例和制度，否决了我的主张。

公子奚斯

《閟宫》诗曰：“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其辞只谓奚斯作庙，义理甚明。郑氏之说，亦云作姜嫄庙也。而《扬子法言》，乃曰：正考甫尝睇尹吉甫，公子奚斯睇正考甫。宋咸注文，以谓奚斯慕考甫而作《鲁颂》，盖子云失之于前，而宋又成其过耳。故吴秘又巧为之说曰：“正考甫《商颂》盖美禘祀之事，而奚斯能作閟公之庙，亦睇《诗》之教也，而《鲁颂》美之。”于义迂矣。司马温公亦以谓奚斯作《閟宫》之诗。兼正考甫只是得《商颂》于周大师耳，初非自作也。班固、王延寿亦云奚斯颂鲁，后汉曹褒曰：“奚斯颂鲁，考甫咏商。”注引薛君《韩诗传》云：“是诗公子奚斯所作。”皆相承之误。

〔译文〕《诗经·鲁颂·閟宫》诗说：“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这两句诗的意思非常明确，是说庙是奚斯建造的。郑玄注解也说奚斯建造的是姜嫄庙。但是《扬子法言》中却说“正考甫曾仰慕尹吉甫，公子奚斯又仰慕正考甫。”宋咸在注释《法言》时，又认为奚斯仰慕正考甫，所以他才写了《鲁颂》。这是扬子失误在先，而宋咸又进一步地将这个错误的说法加以肯定。所以，后来吴秘又牵强附会地引申说：“正考甫写《商颂》是为了赞美祭祀的事，而奚斯能作閟公庙，也是仰慕《诗经·商颂》，所以《鲁颂》赞美他。”这种解释也太偏离原文了。司马光也以为《閟宫》这首诗是奚斯所作。而其实，正考甫只是从周太师那里得到《商颂》，本来就不是他自己作的。班固、王延寿诸人也说奚斯作《鲁颂》，后汉时的曹褒也说：“奚斯颂鲁，考甫咏商。”释解又引用了薛君的《韩诗外传》说：“《鲁颂》诗是公子奚斯所作。”由此可见，这些都是相互沿袭了错误的说法。

唐藩镇幕府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从诸藩府辟置为重。观韩文公送石洪、温造二处士赴河阳幕序，可见礼节。然其职甚劳苦，故亦或不屑为之。杜子美从剑南节度



韩愈像，图出自明·吕维祺《圣贤像赞》。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谥号“文”，故后世又
称其为“韩文公”。

府的两篇序文，可以看出做幕僚的礼节。但这种职务是十分辛苦的，因此也有些人对此不屑一顾。杜甫被剑南节度使严武聘请为幕僚，曾作诗二十韵呈送给严武，诗中说：“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简遂匆匆。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不成寻别业，未敢息微躬。会希全物色，时放倚梧桐。”这首诗的题目叫《遣闷》，他的心情便由此可以想象出来了。韩愈被徐州节度使张建封聘为推官，写了一封书信呈献给张建封说：“我收到聘书的第二天，就有节度使衙门的小职员送来了过去的制度项目十几件，其中有些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例如从九月到二月，都得凌晨进入衙门，夜晚才能回家，除了有疾病事故，否则一律不许外出，像这样的制度要求不是我能做得到的。如果能够宽松一点，使我不压抑自己的本性，寅时（凌晨3点到5点）去办公，辰时（上午7点到9点）能够出来，申时（下午5点到7点）再去办公，酉时结束能够回家，以此为固定的制度，也不会荒废公务。如果能够这样，那么在这地方干到老死，我也不后悔。”杜甫和韩愈的意思，基本上是相同的。

文中子门人

王氏《中说》，所载门人，多贞观时知名卿相，而无一能振师之道者，故议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称高第，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无

严武辟为参谋，作诗二十韵呈严公云：“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简遂匆匆。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不成寻别业，未敢息微躬。会希全物色，时放倚梧桐。”而其题曰：《遣闷》，意可知矣。韩文公从徐州张建封辟为推官，有书上张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节目十馀事来，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宽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率以为常，亦不废事。苟如此，则死于执事之门无悔也。”杜、韩之旨，大略相似云。

〔译文〕唐朝的读书人刚考中进士或者还没有登科做官的，大多数都以能到各藩镇作幕僚为荣。读韩愈写的送石洪、温造二处士（即未做官或不做官的士人）赴河阳军幕

所见，独薛收在《唐史》有列传，踪迹甚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于隋，不肯仕，闻唐高祖兴，将应义举，郡通守尧君素觉之，不得去。及君素东连王世充，遂挺身归国，正在丁丑、戊寅岁中。丁丑为大业十三年，又为义宁元年，戊寅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炀帝遇害于江都，盖大业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归休之命。乃寝疾而终。”殊与收事不合，岁年亦不同，是为大可疑者也。又称李靖受《诗》及问圣入之道，靖既云：“丈夫当以功名取富贵，何至作章句儒”，恐必无此也。今《中说》之后，载文中次子福时所录云：“杜淹为御史大夫，与长孙太尉有隙。”予按淹以贞观二年卒，后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长孙无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此。故或者疑为阮逸所作，如所谓薛收《元经传》，亦非也。

〔译文〕文中子王通著述的《中说》一书，记载的门生弟子，大多数都是唐太宗贞观年间的著名的大臣，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发扬王通学说的，因此后人议论这事时，往往表示怀疑。王通在《中说》讲到说他最得意的学生有程、仇、董、薛四人，考证他们的生平事迹，程元、仇璋、董常三人都没在史载中见到，只有薛收在《唐史》里有传记，生平事迹讲得非常清楚。薛收因为父亲薛道衡被隋炀帝迫害致死，所以不肯在隋朝做官，听到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就准备前去投靠李渊，不料却被河东太守尧君素察觉，所以没能脱身去投奔李渊。后来尧君素勾结占据东都洛阳的王世充，薛收才断然挺身投唐，这事发生在丁丑、戊寅年中。丁丑是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也是隋恭帝杨侑义宁元年，戊寅是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这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杀，也就是大业十四年。但是，杜淹所作的《文中子世家》中却说：“大业十三年炀帝在江都遇难，文中子有病，于是把薛收叫来说道：我梦到颜回来传达孔子让我回归休息的命令。不久，便病重而死了。”这一说法和《唐史·薛收传》的记载不一致，时间上也不同，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地方。又说到李靖向文中子学习《诗经》并请教圣人之道。李靖既然说过“大丈夫应当建立功名而取得富贵，何必去做钻研四书五经章句的腐儒！”由此可知，也不可能会有李靖向文中子请教四书五经的事。现在《中说》一书后边，载有文中子的次子福时的附记，说：“杜淹任御史大夫时，与太尉长孙无忌不和。”我核对杜淹是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死的。死后二十一年，唐高宗做了皇帝，长孙无忌才被拜为太尉，福时的记载与史实差得太远了。因此有人怀疑它是宋朝人阮逸所作，还有所谓薛收的《元经传》，也不是薛收的著述。

晋燕用兵

万事不可执一法，而兵为甚。晋文公围曹，攻门者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言若将发冢者。师迁焉，曹人凶惧。因其凶而攻之，遂入曹。燕将骑劫攻齐即墨，田单纵反间言：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军乃尽掘冢墓，烧死人，齐人望见皆涕泣，其欲出战，怒自十倍，已而果败燕军。观晋、燕之所以用计则同，而其成败顿异者何邪？晋但舍于墓，阳为若将发冢，故曹人惧；而燕真为之，以激怒齐人故尔。

〔译文〕世界上的事情变化万千，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处理事情时不能机械

地采用一种办法，而在用兵打仗方面更应该注意这一点。春秋时期，晋文公领兵包围了曹国都城，攻打城门时，死了很多，曹国人把这些尸体陈列在城墙上，向晋兵示威，晋文公非常担忧。士众们献计说：“把兵营转移到曹国人祖先的墓地去，并且扬言准备挖他们的祖坟。”文公采用了这个计策，把兵营移向曹人坟地。曹国人看见后，恐惧得喧嚷骚动起来。晋兵便趁曹军混乱恐惧的时机突然袭击，很快就攻下了曹国都城。战国的时候，燕将骑劫攻打齐国的即墨，守将田单派间谍去散布谣言，说齐国人最害怕的是燕国人挖他们城外的祖坟。燕军听到这个消息，真的去把城外的坟墓都挖开，把死人尸骨堆积起来烧掉。齐国人在城上看见后都痛哭了起来，怒火中烧，纷纷请战出兵，结果把燕军打得大败。看起来晋、燕两国所用的计策相同，但结果却截然不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晋文公驻兵于曹国坟地，假装要挖他们的祖坟，所以曹国人担心害怕；而燕军却真的去挖了，以致激怒了齐国人。

李卫公帖

李卫公在朱崖，表弟其侍郎遣人饷以衣物，公有书答谢之，曰：“天地穷人，物情所弃。虽有骨肉，亦无音书。平生旧知，无复吊问。阁老至仁念旧，再降专人，兼赐衣服器物茶药至多，开缄发纸，涕咽难胜。大海之中，无人拯恤，资储荡尽，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绝食。块独穷悴，终日苦饥。惟恨垂没之年，须作馁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药物陈衰，又无医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书

后云：“闰十一月二十日，从表兄崖州司户参军同正李德裕状侍郎十九弟”。按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马贬崖州，所谓闰十一月，正在三年，盖到崖才十馀月尔，而穷困苟生已如是。《唐书》本传云：“贬之明年卒。”则是此书既发之后，旋踵下世也。当是时宰相皆其怨仇，故虽骨肉之亲，平生之旧，皆不敢复通音问。而某侍郎至于再遣专使，其为高义绝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此帖藏禁中，后出付秘阁，今勒石于道山堂西。绍兴中赵忠简公亦谪朱崖，士大夫畏秦氏如虎，无一人敢辄寄声，张渊道为广西帅，屡遣兵校持书及药石、酒面为馈。公尝答书曰：“鼎之为己为人，一至于此。”其述酸寒苦厄之状，略与卫公同。既而亦终于彼，手札今尚存于张氏。姚崇曾孙勛为李公厚善，及李潏逐，撻索支党，无敢通劳问。既居海



李德裕像。李德裕是唐代后期的著名宰相，被封为卫国公，故又称“李卫公”。

上，家无资，病无汤剂，勘数饷候问，不傅时为厚薄，其某侍郎之徒与！

〔译文〕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被贬降到朱崖（今海南琼山东南）以后，他担任侍郎的表弟派人给他送去一些衣物。德裕写封书信答谢他说：“我是个天地间的穷困人，现在受到社会人情的冷落，纵然还有至亲骨肉存在，但是却没有人与我通音信了。生平的朋友故交，也不再向我问候。你怀着仁德之心，不忘故交，两次派专人来看望我，并赐给我衣服器物茶药等很多东西，打开你的来信，我忍不住落下眼泪。现在我住在大海之中的孤岛上，没有人帮助和怜恤，所带的钱财也早已经用光了，家里一贫如洗，家里一百多人饿得嗷嗷叫，常常上顿不接下顿。我因为孤独和穷苦变得憔悴，整天苦于饥饿难挨，可怜我临到晚年，还得做个饿死鬼。十月末，我卧病在床，躺了七十天，到处是药物，却没有良好的医生，只好听从天命，幸而现在还能活着。”书信落款是：闰十一月二十日，从表兄崖州司户参军同正李德裕回复侍郎十九弟。按：李德裕是在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在潮州司马任上被贬到崖州（今海南琼山）的，信中说的闰十一月正是大中三年，这距他到崖州才十个月，而穷困潦倒竟已到了这种地步。《唐书·李德裕传》中说他“贬职的第二年去世。”那么，李德裕应该是在这封信发出后没几天就因病去世了。当时在位的宰相都是他的冤家对头，所以虽是至亲骨肉，平生故交，也都不敢和他通信问候，可是这个侍郎却敢派出专人去探望他，足见他的高尚品德和义气，远远超过了世俗之人，可惜这个侍郎的姓名无从考证了。李德裕写的这封信，本来在宫内收藏，后来才移交给管理图书档案的秘阁，现在已被刻成石碑，立在道山堂的西边。高宗绍兴年间，忠简公赵鼎也被贬官到朱崖，大小官员害怕宰相秦桧就像畏惧老虎一样，没有一个人敢向赵鼎问候。而在广西当军队统帅的张洵道却屡次派兵和下属军官带着书信和药物、酒去探望他。赵鼎曾经回信说：“我自问平生没有做过亏心事，可是现在竟落魄到这种地步。”他诉说自己辛酸穷苦的状况大致和李德裕相同。后来，赵鼎也死在崖州，他写的信至今还保存在张家。唐朝宰相姚崇的孙子姚勔，与李德裕交情非常好，等到李德裕因谗言被放逐后，还要揭发搜捕他的同党，因此没有人敢向李德裕通信问候。后来德裕又贬降到海南岛上，家里没钱，生病没药，姚勔多次给他送去粮食和药品，并致以问候，丝毫不害怕人们的议论，由此可知，他也是和某侍郎一样刚正不阿的君子啊！

王孙赋

王延寿《王孙赋》，载于《古文苑》，其辞有云“颜状类乎老翁，躯体似乎小儿”，谓猴也。乃知杜诗“颜状老翁为”盖出诸此。

〔译文〕汉朝王延寿所作的《王孙赋》，载录《古文苑》一书里。其中有一句话说“面貌形状如同老翁，身体躯干酷似小孩”，这句话形容的是猴子，由此可知，杜甫诗“颜状老翁为”的出处可能就是这里。

汉郡国诸官

西汉盐铁、膳羞、陂湖、工服之属，郡县各有司局幹之，其名甚多，然居之者

罕。尝见于史传，今略以《地理志》所载言之，凡铁官三十八，盐官二十九，工官九，皆不暇纪其处。自余若京兆有船司空，为主船官。太原有捫马官，主牧马（元名家马官），辽东有牧师官，交趾有羞官，南郡有发弩官，严道有水官，丹阳有铜官，桂阳有金官，南海有涯浦官，南郡江夏有云梦官，九江有陂官、湖官，胸忌、鱼复有橘官，鄱阳黄金采，主采金，亦有官。在内则奉常之均官、食官；司农之斡官；少府之大官主膳食，汤官主饼饵，导官主择米，如是者盖以百数。

〔译文〕西汉时，盐铁、饮食、陂湖水利、手工技艺等方面，各州县都设置有专门的官吏管理，名目很多，但真正派有官员到任的却很少，这从史书中是可以了解到的。现在将《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简单说一下。全国共有铁官三十八个，盐官二十九个，工官九个，但都没有记载他们设立的地址。其他的如京兆（今陕西西安）有船司空，是负责管理船只的官员。太原有捫马官，主管放牧马群，辽东有牧师官，交趾郡（治今越南河内西北一带）有管饮食的羞官。南郡（今湖北江陵）有发弩官，严道（今四川荣经）有水官，丹阳（今安徽当涂）有铜官，桂阳郡（今湖南郴州）有金官，南海郡（今广东）有涯浦（今广东英德西南）官，南郡江夏（今湖北云梦东）有云梦官，九江有陂官、湖官，胸忍（今四川云阳西）、鱼复（今四川奉节）有桔官，鄱阳黄金采，主管采金矿，也有官。朝廷内部则在奉常下，设有主管乐器的均官，主管祭品的食官；司农寺卿下又设有主管贩卖粮食的斡（音义同管）官；少府下又设有主管皇帝膳食的大官、主管糕饼的汤官、主管选米的导官，等等，这样的官职有百多个。

汉狱名

汉以廷尉主刑狱，而中都它狱亦不一。宗正属官有左右都司空。鸿胪有别火令丞，郡邸狱。少府有若卢狱令，考工共工狱。执金吾有寺互、都船狱。又有上林诏狱，水司空掖受秘狱，暴室、请室、居室、徒官之名。《张汤传》苏林曰：“《汉仪注》狱二十六所。”《东汉志》云：“孝武帝所置，世祖皆省之。”东汉洎唐，虽鞫囚非一处，然不至如是其多。国朝但有大理及台狱，元丰、绍圣间，蔡确、章子厚起同文馆狱之类，非故事也。

〔译文〕汉朝由廷尉主管刑狱，但是京城里其他衙门的监狱也不是只有一个。宗正府的属官中就设有负责审案和监禁犯人的左右都司空。鸿胪寺衙门有别火令丞和郡邸狱。少府衙门又设有若卢狱令，考工衙门也有共工狱。执金吾衙门有寺互、都船狱。还有上林诏狱（奉皇帝诏命关押犯人的地方），水司空掖受秘狱，以及暴室、请室、居室、徒官等监狱名称。《汉书·张汤传》苏林注释说：“《汉仪注》记载的有二十六所监狱。”《后汉书》里又说：“这些监狱都是汉武帝设立的，光武帝把这些监狱全部撤销了。”从东汉到唐朝，虽然有权力审问和囚禁犯人的衙门不只是一个，但也不至于有这样多。我们大宋朝，只有大理寺衙门和台狱官有权力审问和监禁囚犯。至于神宗元丰、哲宗绍圣年间，蔡确、章惇曾兴起的同文馆狱之类，都是不合乎旧有体制的。

第二卷

权若讷冯澥

唐中宗既流杀五王，再复武氏陵庙。右补阙权若讷上疏，以为：“天地日月等字，皆则天能事，贼臣敬晖等轻紊前规，削之无益于淳化，存之有光于孝理。又神龙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岂可近舍母仪，远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钦宗在位，惩王安石、蔡京之误国，政事悉以仁宗为法。左谏议大夫冯澥上言：“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孙之心，宁有厚薄？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顾无作好恶，允执厥中，则是非自明矣。”诏榜朝堂。侍御史李光驳之，不听，复为右正言崔鶪所击。宰相不复问，而迁澥吏部侍郎。按若讷与澥两人，议论操持绝相似，盖澥在崇宁中，首上书乞废元祐皇后，自选人除寺监丞，其始终大节，不论可见。建炎初元，乃超居政地，公议愤之。

〔译文〕唐中宗即帝位后，听信武三思的谗言，流放和处死了五位王爷，又复原了武氏的陵庙。右补阙权若讷上奏疏说：“天地日月等这些新字，全是武后（即武则天）所创造的，奸臣敬晖等轻率地改变过去的制度，如果把这些字废除，对风俗教化并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保存下来，还有发扬孝道的作用。另外，神龙年间所颁布的诏书，大小事都遵循太宗贞观时的旧例，怎能将最亲近的母亲舍弃，而去推崇较远祖先的道德呢？”这份奏疏送到中宗那里，中宗特加了批语表扬他。钦宗在位时，谴责王安石、蔡京擅权误国，所以所有的政策都仿效仁宗时的做法。左谏议大夫冯澥上奏说：“仁宗皇帝是陛下的高祖，神宗皇帝是陛下的祖父，子孙敬重祖之心，难道还分厚薄吗？王安石、司马光都是神宗时名闻天下的大贤人，他们的好坏，自有天下人来评论，希望陛下不要先有成见，而要公正中肯地看问题，那么他们的是非自然就能看得清楚了。”钦宗阅读后，将它公布于朝堂内让大臣们议论。侍



夏禹像，图出自明·天然撰《历代古人像赞》。